

落的文明与文明的历程书系

世界当代史

SHIJIE DANGDAI SHI

历史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

有的文明最后竟由辉煌走向衰落

乃至被历史长河所湮没

而后世的人们却以极大的热情寻找这些失落的文明

好在世界文明的整体是向前发展的

呈现出波澜壮阔，一往无前的趋势

使得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更精彩而有意义

[下册]

欧阳云 紫都 主编

记录人类文明史上的苦难与辉煌

远方出版社

失落的文明与文明的历程书系

世界当代史

下 册

欧阳云 张书珩 主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 文

封面设计：贾艳斌

失落的文明与文明的历程书系

编 著 者 紫都、杨超等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90
字 数 6080 千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23 - 037 - 1/I·15
定 价 475.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第二节 赫鲁晓夫时期

一、赫鲁晓夫上台

赫鲁晓夫通往最高权力之路在 1953 年至 1955 年间，是和马林科夫的执政与辞职之路相平行的。总的来说，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形势把他们推到了苏联领导的最高层地位。但马林科夫却昙花一现，成了过眼云烟。而赫鲁晓夫却在苏联最高层领导的权力斗争中逐步取胜，最终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正言顺和名副其实的权势号令全党和全国，并为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苏联政府的首脑铺平了道路。

这里自然有赫鲁晓夫本身的各种优势，有各种促使他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与其思想、行为和性格相关的因素。

第一，赫鲁晓夫实际上领导了反对贝利亚的斗争。在当时，反对贝利亚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中都有的想法。但反对贝利亚到什么程度和怎样来反对贝利亚，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因为他们既想反对贝利亚，又极其害怕他。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却坚持了三点：1. 一定要公开揭露贝利亚；2. 一定要把反贝利亚的斗争进行到底；3. 一定要团结最高领导层中的每个人来反对贝利亚。

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显示他谙熟苏联最高层权势斗争之术。他极其谨慎地筹划了一切，团结了那些较为坚决反对贝利亚的人，争取了那些动摇不定的人，最后拉上了与贝利亚有各种瓜葛的人。在反对贝利亚斗争的关键时刻，赫鲁晓夫表现出的坚定保证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反贝利亚的斗争不仅是一场权力之争，而更重要的是苏联国家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国家和人民需要有一个较为民主的政治领导和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的总趋势。在这场斗争中，苏共中央一班人重新审视了赫鲁晓夫的领导、组织和斗争才能，真正确认了他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对于赫鲁晓夫来讲，这场斗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这一斗争的实际组织者，而更在于他在斗争中显示了他潜在的政治实力，并且让周围的人承认他具有这种实力。

第二，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赫鲁晓夫承认农业发展落后，提出要着重发展农业。尽管他在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中掺杂了他本人的主观想像、随意性和感情，但对国情的较为正确的分析和解决农业问题的认真努力，却使他赢得了威信，尤其是在集体农民中间。

这几年中，有关农业的许多问题都是赫鲁晓夫亲自在抓的。因此，赫鲁晓夫才能透过多年来升腾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上空的迷蒙的金色光环，看到了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正是他在所有的苏联领导人中第一次提出了苏联农业发展有问题，并把苏联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的问题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这种努力加强了他在反贝利亚斗争后所取得的政治地位，打开了通向最高权力之路。

第三，他大力宣传党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作用，全力整顿自中央至地方的党的组织：使中央机构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充分发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而在地方党的领导机构中撤换了一批对新的路线持反对立场和动摇不定的人，保证了地方党组织对中央的绝对支持。几年中，他在苏联生活中确立了一个新的概念：党就是党，党不是斯大林个人。这种新概念保证了他能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

名义正式行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令畅通。

第四，赫鲁晓夫有着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他精于权术。赫鲁晓夫在1955年1月中央全会上对马林科夫的指责显然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马林科夫在执政期间并没有宣布过要以超过重工业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要执行一种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主的新方针。他所强调的只是在当时形势下着重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实际需要。他的经济纲领只不过是过去路线的延续。这种延续的内容不属于他个人（当然也不属于赫鲁晓夫个人），而是当时党中央一班人所持有的共同看法。

在苏联历史上，每当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国家出现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时，领导人中总有人出来指责轻重工业发展的比例失当，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失调。这时摆锤便向轻工业部门倾斜，一段时间后摆锤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而那种一时的倾斜便被指责为是右倾，是机会主义路线。马林科夫在经济问题上并无真正的革新，他所讲的只不过是重现一种历史现象，一种传统的回归。而赫鲁晓夫恰恰利用了这种重现的历史现象，这种回归，实施了他的权术之变，解除了马林科夫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职，将中央权力集中于自己之手。

第五，就个人作风而言，赫鲁晓夫平易近人，有时甚至粗鲁。他能以通俗的语言和工农交谈。可以说，赫鲁晓夫是自列宁以后所有苏联领导人中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状况最有切身体会的人。这一点，就连至死都在抨击他的莫洛托夫也承认。莫洛托夫说：“赫鲁晓夫到地方上去过好多次，他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本人极为频繁地呆在农民中间，在这一点上，对他无可指责。他到处都去——在锅炉房，在马厩，但问题不在这方面。当然，较之列宁，较之斯大林，他更经常地与

普通农民和工人见面，这一点决不能否定。他们对他较少有拘束，把他看成是自己人，是人民的人。”

正是这种新形象帮助赫鲁晓夫在国内、党内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总之，在这几年中，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内部的威信越来越高。他不仅有了名正言顺的名义，而且拥有实权。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和决策人。当马林科夫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后，赫鲁晓夫离最高权力之巅只有一步之遥。

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担任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党的内外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尽管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要对斯大林时期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某些变革，但是在如何进行变革和变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分歧还很大。作为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把最高领导层以致全党的思想都统一到他的观点上来，以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为此，他对代表大会的召开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首先，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在 30 年代至 50 年代被清洗和镇压的人恢复名誉。

其次，在恢复和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断然的措施。

1955 年 7 月 4 日至 12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问题，确定大会的议程，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专门委员会。7 月 12 日，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莫斯科州召开第十二次党代表会议，选举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伯里雅耶夫、波斯伯洛夫、谢皮洛夫等 15 人，为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代表。

1956 年 2 月 14 日上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参加会议的人们注意到，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悬挂斯大林的画像。赫鲁晓夫宣布大会开幕。在选举了大会的各种组织机构以后通过了大会的议程：1. 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报告人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2.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报告人是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3. 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指示，报告人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4. 党中央机构的选举。

首先是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对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1. 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指出“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实行合作”，“进行经济竞赛”。2. 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赫鲁晓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力量已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和物质手段，因此“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3. 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指出，由于世界舞台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

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赫鲁晓夫上述关于国际形势的论断是对传统的帝国主义论和十月革命“共同道路”论的修正，成为苏联对外政策新格局的理论基础。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布党中央已为“列宁格勒案件”平反，并正在审查其他一些可疑的案件；着重论述了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其中居首要地位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并不指名地批评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苏联社会性质及发展轻工业问题上的“理论错误”；他还强烈呼吁尽力恢复和加强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个人崇拜。

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布尔加宁所作的关于1956—1960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标的报告。2月16日，米高扬在大会上发言，颂扬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支持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具体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缺点。2月18日，莫洛托夫在会上发言，强调指出“既然存在着帝国主义，也就存在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不应该高枕无忧，似乎可以用好话和爱好和平的计划来说服帝国主义者”。

二十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上届125名中央委员中只有79人重新当选。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大会正式议程全部结束后，2月25日凌晨，赫鲁晓夫不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对，决定以代表的身份而不是以主席团委员的资格，向到会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

这一报告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全面评价，只是揭露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述了斯大林滥用权力和违反法制的种种表现：

1. 斯大林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看法看成是对敌斗争，抛弃了列宁的说服和教育的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向行政压力的道路。例如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集团的斗争都是如此。

2. 斯大林对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赫鲁晓夫指出，这种大规模清洗主要是在 1936—1939 年间进行的，其中以 1937—1938 年间最为激烈，一直延续到卫国战争的开始。他说：“调查结果表明，在 1937—1938 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来也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而他们其实一贯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指出，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但是这次大会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却有 83 名被逮捕和镇压（大部分是在 1937—1938 年间）。这次大会的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名，即超过半数的人也因反革命罪而遭到逮捕。

3. 斯大林违背列宁的教导，不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以个人意见代替党的决议，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彻底破坏了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他说：在列宁去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大体上是定期召开的，而稍后，当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时，这些原则就开始遭到粗暴的破坏。在其生命的最后 15 年里，这表现得尤为特出。

4. 斯大林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增加自己的光荣和声望，从而使对自己的崇拜发展到了可怕的地步。赫鲁晓夫以《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为例指出，在很多书籍和大量文艺作品中，斯大林被神化了，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贤哲，最‘伟大的领袖’和‘一切时代及各族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统帅’”；“使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历史中十月革命后的整个时期只成了‘斯大林天才’事业的陪衬”。

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分裂了党的队伍，削弱了党的干部力量，造成了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触发了严重的民族问题，使社会产生动荡并潜伏着不安和危机。这种情况，愈到斯大林的晚年就愈为严重。他不止一次地在报告中指出：“斯大林晚年形成的领导实践成了苏联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渊源于他理论上的错误。他说，斯大林有种说法，即“愈接近于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正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大量的犯错误的人、和斯大林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同志和朋友都是被加上“人民的敌人”这个罪名而遭到镇压的。而在当时的实践中，所谓“人民的敌人”就是从肉体上被消失掉了。

但赫鲁晓夫同时指出：“所有这一切他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来考虑的”。斯大林的真正悲剧就在于：“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者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需这样做”。

最后，赫鲁晓夫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品质上的问题：好功厌过、刚愎自用和多疑。他认为，这是造成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赫鲁晓夫号召人们揭露和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中的恶果。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在代表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方针，特别是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揭露、批判，加剧了领导层中的矛盾和冲突。1956年6月1日，即铁托访问苏联的第二天，莫洛托夫“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由谢皮洛夫继任。“二十大”后，东欧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发生信仰危机，大批党员退党，帝国主义利用批判斯大林掀起反苏反共的恶浪。国内，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仓促进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和困难。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抓住这一形势，趁赫鲁晓夫出访芬兰的时机，策划了一次反赫鲁晓夫的行动。

1957年6月18日，赫鲁晓夫一回国，就在苏共主席团特别会议上遭到围攻，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纷纷发言，揭露和谴责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指责赫鲁晓夫推行“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指出在经济领域搞“唯意志论”，开荒运动是“冒险行动”，其农业政策是“右倾农民路线”，强调反斯大林将会动摇党的权威地位。他们要求重新考虑二十大的路线和对外政策，撤掉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会议对此进行表决，结果7票同意，3票反对，1票弃权。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根据表决宣布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但赫鲁晓夫奋力反抗，宣称“我是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也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把我罢免，主席团会议的决定无效”，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进行最后表决。

6月22—29日，举行了中央全会。赫鲁晓夫作了《苏联党内形势》的报告，莫洛托夫作了《苏联的国际地位》的报告，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由于二十大选出的中央委

员大部分支持赫鲁晓夫，因此形势大变，赫鲁晓夫转败为胜。中央全会否决了主席团会议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揭发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马、卡、莫等人反对苏共二十大关于纠正个人崇拜错误的方针，反对经济改革与和平外交，力图更换党的领导机关，使党和国家离开列宁主义道路。决议宣布将马、卡、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及主席团。

7月4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撤销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的职务，派往哈萨克斯坦任一电厂厂长；撤销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派往乌拉尔山区任一水泥厂厂长；撤销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监察部部长职务，8月调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

1957年10月底，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全会相继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并通过《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谴责朱可夫粗暴地破坏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一个“政治上站不稳的人”。同时，任命马利诺夫斯基为国防部长。1958年3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布尔加宁曾参加莫洛托夫为首的“反党集团”，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决定由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样，赫鲁晓夫违反他自己在5年前宣称的一个人不能同时担任党政最高双重领导职务的规定，集党政最高职务于一身，独揽党政大权。

1960年5月5—7日，第五届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同意伏罗希洛夫提出的“因健康情况不佳”解除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请求，并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至此，斯大林时期的主要领导人都被排除出苏联党政最高

决策机关。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也相应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到 50 年代后半期，基本上把反对改革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人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撤除，从组织上为推进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苏联的干部队伍变动较大，存在某些偏差和错误，一些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言行进行抵制的人遭到排斥、打击，但总的来说，这些人事上的变动，不能简单说成是争权夺利的斗争或篡党夺权的活动，它是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改革的艰巨性及斗争的尖锐性。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虽然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也赞同对斯大林时期某些政策方针作必要的调整，在对赫鲁晓夫的抵制中也有正确的地方，但是从改革的全局来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落后于发展变化的现实，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在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归于失败的命运。

三、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顺应时代潮流，对斯大林时代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在他执政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的探索。

第一，批判个人崇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30 年代以来，苏联政治生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个人崇拜盛行。斯大林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个人独断专行，谁要是稍有异议便遭到批判、斗争，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压制。唯命是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成为社会风气的痼疾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种具体历史条件下，只有批判个人崇拜，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才能解放思想，冲破僵化模

式，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赫鲁晓夫敏锐地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果断地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

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开始强调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主张正确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批判个人崇拜的唯心主义理论。1953年7月13日，《真理报》就贝利亚事件发表题为《最严格地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的社论，强调“一个人的决定，从来是或者几乎从来是片面的决定”。1954年1月21日，在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在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强调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大胆地公开地进行揭露批判。此后，苏联在思想理论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下，对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了反思和清算。

1954年5月，作家爱伦堡在《旗帜》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1956年发表第二部），小说塑造了一群备受创伤委屈的群像。自此，以揭露社会阴暗面为特征的所谓“解冻文学”盛极一时，出现了文学上的“春暖解冻”时期。同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鼓励作家大胆自由创作。

苏共“二十大”把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推向了公开的新阶段。如前所述，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工作报告中就是针对斯大林的观点来对当代世界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论述和修正。在秘密报告中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斯大林滥用职权，镇压无辜的错误和“罪行”。二十大闭幕后，根据苏共中央指示，秘密报告先后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基本上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十大”后，报刊上出现了批判个人崇拜的高潮，在哲

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军事学等领域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过程中曾出现消极的后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机兴风作浪，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动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动荡。苏联国内也发生了思想上的某些混乱，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斯大林，有人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有的怀着成见只寻找阴暗面，而抹煞社会主义的成就。在理论界出现了背离马列主义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为了稳定局势，赫鲁晓夫暂时改变了对斯大林的评价，并对某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说“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大家都是斯大林主义者”。1956年底，赫鲁晓夫宣布，曾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的，杜金采夫所著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系反苏作品。1957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严厉批评《历史问题》杂志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幌子下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辩护，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谴责目前的修正主义倾向。

但是事隔几年后，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会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移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随后进一步在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中清除个人崇拜的影响，开展对斯大林的批判。全国到处拆毁斯大林纪念像和纪念碑，斯大林格勒也更名为伏尔加格勒。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对不正常的公安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个人崇拜在苏联造成的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大规模迫害忠诚的干部和无辜的公民，保安机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由斯大林直接控制。赫鲁晓夫首先整顿了国家保

安机关，以贝利亚事件作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1953年6月，在清除贝利亚的过程中改组了内务部。1954年成立了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加强了各级党和政府对保安机关的监督，只允许克格勃拥有调查和逮捕权，而审讯和判决由法院执行。此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加强群众的治安管理和监督。1960年1月14日。苏联政府撤销了内务部，将其职权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斯大林逝世不久就开始了。1953年4月4日，塔斯社宣布“医生间谍案件”是前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员捏造的，决定释放15名在押的有关人员，恢复其名誉。还对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进行复查，并宣布此案是野心家捏造出来的，为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等人恢复名誉。1954年成立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滥用职权的问题。到二十大前夕，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给7679人恢复了名誉，其中不少被释放。实际得到平反昭雪的达几万人。“二十大”后，党中央为30年代受害者图哈切夫斯基、布勃诺夫等恢复了名誉。党中央还成立了李可夫、布哈林等人的专案复查组，经查证明，他们当年是在威胁和严刑拷打下才被迫供出“耸人听闻”的罪行。赫鲁晓夫原准备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但受制于国内外的压力，被迫放弃了这一行动。到1957年止，西伯利亚2/3的劳改营被取消，释放了90%以上的“政治犯”。文艺界以往进行的错误批判也普遍得到纠正。

反对个人崇拜，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呈现了新气象，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有了一定扩大，因政治犯罪而受审判的现象大为减少。党内斗争的情况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遗风，如处理贝利亚运用宫廷政变的办法，